

第四章 一窩蜂新聞產製之來龍去脈

第一節、傳播者個人層次

一、恐懼感

上一節的「機械化模式」提及「記者在恐懼中容易從眾」，到底記者恐懼什麼呢？原因有三，一是恐懼「孤單與寂寞」，二是恐懼「錯誤的新聞判斷」。三是「害怕漏新聞」。

一個獨立自主的新聞工作者，不僅要有著自重（self-esteem）、自恃（self-reliance）與不依賴他人的個性，更要抗拒許多外力的施加，此種人即為奉行存在主義新聞學的記者，他們是孤獨的，經常無法升遷、調薪、甚至必須承擔隨時可能被解雇的厄運（Merrill, 1996 / 周金福譯，2003: 8）；另一種人，則是以調查報導為志業的記者，其特性與第一種人類似，他們是一群替民眾擔任守望功能的看門狗，熱切投入新聞行業進行調查，調查的是會對社會大眾造成莫大影響之個人與組織（林照真，2006）。Merril視上述這兩種人，才是正統新聞人，擁有膽識、勇氣、奈逆的個性；然而他認為，現今的記者是最尷尬無能的一群，他們的精神漸趨軟弱，完全遺忘所被賦予的責任，害怕遭消息來源、同業遺忘或冷凍，所以花了許多時間與同業在建立關係，跑新聞時經常呼朋引伴，無法一人獨立完成作業，因此出現了「一窩蜂群聚」的現象。

我跟你說最菜¹⁵的時候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什麼，打電話，假如說我今天被分配到什麼，或是說你還沒有被分配到，可是你不知道要做什麼你會害怕，你就問跟你同一條線上面的人今天要做什麼..（受訪者 C12）。

所以記者爲了不要犯錯，會採取與其他同業一致的新聞線索，這是最安全的作法，若判斷錯誤，也是所有人一起錯，可減低負擔責任的風險，使得新聞內容變得愚蠢，過於一致性。

記者會跟其他人原因是，這記者實在也挖掘不出來更好的新聞，於是他選擇一個最簡單的，跟別人一起去，很安全，這則新聞也發得出來（受訪者 M3）。

不過就算「獨立自主」的記者，仍然會受到其他外在因素影響，使得新聞內容趨向一致性。獨立自主是一個正直的記者與編輯所尋求的禮物，每日的例行採訪，他們不想時時受政府官員、媒體擁有者、廣告商與市場競爭左右，他們希望可以根據心中最佳的指示燈（新聞判斷），進行每日的新聞採訪工作。Rodney

¹⁵ 「最菜」，指剛進新聞產業工作的菜鳥（資淺）記者。

與Erik (2005) 說，「新聞判斷」並非個人所屬，而是全體新聞場域人員所建構而成，在過程中，會有爭執、辯論，記者必須與上司或編輯商量：「這個線索是否成爲故事？能放頭條嗎？這是內部情形或是謠言？值得我們去揭露嗎？」此過程理應無規則可循，所以兩個不同新聞單位，應該不可能以同樣方式操作，但記者個人卻因害怕新聞判斷錯誤，而甘願讓外力左右，例如《公車仔》(The boys on the bus) 描述選舉政治線記者的眾生相，發現記者的未來職業生涯是否蓬勃發展，來自於他是否「正確判斷」進而能夠跟隨優勝者的一方，「待在優勝者的巴士」(to be on the Winner) (Yardley, 2004, August 27)。而媒體主管，在與記者討論新聞線索重要性與否，以及記者人力調度上，雖不是絕對，但也時常依據在新聞採訪現場的其他媒體數量，作爲參考依據。

會問有哪幾台在場，比如說我今天人不夠，像今天，政府要去查三立的違建，那我就問有哪幾台在，因為這東西蠻敏感的，而且我們跟三立的偶像劇有合作關係，如果是立法委員在那邊作秀，我覺得可以放手，那我記者說他去看看，我說你去看看好了，後來他就跟我回報說：「只有東森跟中天在。」，那我說：「到底有查到什麼？」，他說：「沒有」，我說：「那就算了」，這新聞可以不要了 (受訪者 M3)。

我並不一定是說其他家台在，我就一定要去，它是一個參考，這條新聞我會不會全國獨漏的一家，或這條新聞的重要性，我會參考別人的判斷，當我在辦公室的時候我必須要問 (受訪者 M3)。

怕漏新聞，是一窩蜂的源由之一，也是評斷記者考績的標準，漏新聞代表記者能力不足，或未善盡記者應有的顧線職責，深層意義更在於收視率、觀眾喜好度以及品牌忠誠度。

漏新聞是這樣的，就是說如果這個新聞事件當中，某一台找到重要人物的關鍵點，因為他有，我們沒有，那理所當然了，這會反應在兩件事情上面，第一我們追查新聞的能力，督導，還有記者採訪新聞的主動性的能力都不如人家，為什麼他能找到，我不能找的到，我們必須要檢討哪一環出了問題，第二是，那它(台)有，當然觀眾就會看它的啊，就不會看我們的啊 (受訪者 M1)。

從訪談發現，所有媒體主管，對於漏新聞戒慎恐懼，而判斷記者是否漏新聞的準則，則是從監看他家電視台畫面得知，因此新進記者第一課，就是學會如何顧好線，如何在時間緊迫的壓力下，不漏線呢？方式之一就是乾脆與線上同業合作，一同跑新聞，那各台新聞都會一樣，主管就不會發現記者漏新聞，惡性循環結果，造就新聞的高同質性，缺乏獨家的開發。

公司長官會把我們罵到有責任感，讓我們去顧線上該有的事情，如果我沒有掌握到什麼東西的時候，反而會長官罵，是一件很難堪的事情，最好的結果就是大家都有（受訪者 C14）。

台灣那麼小，又那麼多家，你現在一天也沒有那麼多少時間去找（線索）啊，現在就是交換合作啊，要交流，競爭都沒好下場啦，如果同業不跟你講在哪裡，你就自己找的半死（採訪地點、受訪者），過了時間你就會被罵（受訪者 C13）。

現在的記者一大早打電話去給別台，「你今天要做什麼？」，因為他們可以避免漏新聞，這樣長官就不會 K 我阿，所以你看，在爛的新聞都有一堆麥克風堵在那邊，大家求不漏而已，沒有人獨家（受訪者 M3）。

因恐懼而群聚，從新聞主管開始劃地自限，以監看他台新聞頻道判斷新聞重要性、取得新聞線索，「（公司裡頭）一排電視是給長官看的，長官看那一台有新聞，我們沒有，就派我們去，反正就是一大堆人去作，你就跟著去作，就對了（受訪者 W3）。」在藉此安排記者一天工作、判准記者是否達成要求，而記者本身，就以群聚合作方式抵抗，久而久之，媒體能量漸漸耗盡，如同循環熵般，使得整個新聞產業趨疲沈淪。

Rodney與Erik（2005）說「新聞判斷」的專業能力，是可以超過政府與商業的控制，但對記者而言，不必然是一個對於民主社會有利的禮物。換句話說，記者理所當然應避免商業與政府控制所導致的腐化，但更應小心在同樣的工作氣氛下，所導致新聞判斷、新聞內容趨同的危害。「一致性的意見」就像是一個類宗教性的膜拜，比如說，世界末日一直被預測在千禧年時會來臨，而到了那一天，地球沒有爆炸，世界末日沒有降臨，所有人不僅沒有改變他們的信仰，反而質問這日子的預估為什麼錯了。又或者，當所有人都朝向同樣的推測（尤其在著重即時性的重大新聞）前進，沒有別的觀點進來，導致一家錯、家家錯，而在錯之後，檢討收視率，質疑為什麼閱聽眾流失？但過陣子在新聞場域裡，所有人仍然還是依循著一貫的新聞手法做新聞。

二、自我角色認知的差異

前述從記者內心世界，探究「一窩蜂」的原因為何。本部分則要從「自我定位」面切入，兩種面向，非全然毫無相關，是一體兩面，互為因果，因此在敘述上會有重疊之處。

若用二分法區分新聞記者，可分為「中立者」與「鼓吹者」（Cohen, 1963），前者視「反應現實、平衡報導」為新聞意理，後者則著重在成為「社會批評者與闡釋者」，兩種新聞理念皆正確，差別是在於記者對自己的要求。中立者若只是

崇尚鄉愿的平衡，兩面併陳，只是一種「安全新聞學」（林照真，2006: 305），為的是消弭恐懼感，亦容易隨外界力量搖擺從眾。

你今天要指控一個人官商勾結，你在時間壓力下沒有辦法查證，即使我知道這件事是真的，我沒有證據，那我要把訊息釋放出來。就必須去問雙方的 bite，基本的假平衡，保護自己（受訪者 M3）。

另一種區分，記者在新聞場域扮演角色—追隨者或意見領袖。早期傳播學研究，將兩級傳播與意見領袖扣連討論，主要闡述媒體的傳播效果，發現是經由「意見領袖」此中介者，流傳到一般民眾。「意見領袖」的特色是：時常扮演「溝通者」的角色、比其他追隨者擁有更多大眾、更廣的人際傳播管道、更高的社會地位、更強的決策能力（林東泰，2002），從「社會角色理論」（social role theory）來看，當個人扮演「追隨者、服從者」的角色，容易在群體中出現從眾行為。雖此處所指的「意見領袖」以閱聽人為主，新聞場域中的傳播者本身，也有此現象。

我進入採訪現場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先看看現場有沒有比自己更資深的、可敬的對手，如果有，要隨時注意對手的行蹤，並瞭解對方做新聞的面向，請教同業資深記者新聞怎麼發（受訪者 C6）。

比如說我現在得到一個訊息，假設趙建銘在上面（法院）又被收押，不無可能啊，他們（資淺記者）一定覺得怎麼可能收押，但如果真的收押就不用在這邊守，就要到另外一邊去守，那一般人不知道，我現在如果拿著機器往另外一邊走，所有人就會跟著走（受訪者 W6）。

可敬的資深記者，時常扮演同業間的意見領袖，資淺記者會藉由注意、請教對方，增進自己職業知識智能，這是一種很好的學習管道，但是，如果同一條線上普遍而言都是資淺記者，資深記者寥寥可數，就會變成所有人都跟在資深記者後面跑新聞，缺乏新聞開發能力，新聞場域的一窩蜂現象，就此而生。

三、 缺乏新聞知識、成就動機不高

老三台時代的記者若要踏進新聞圈需經過重重關卡，進入後更需經過長期、紮實的培訓，成為訓練有素的專家，才能上線採訪。因此，篩選進來的記者相對而言知識水平也較高，當他們在向受訪者發問時，會有自己的想法，不會盲從跟隨他台記者，生產出雷同度較高的新聞內容。

如果你今天這些人都很強，就會各自為政，你一個人就可以搞定，那你都不很強，大家就會策略性的合作，交換有無，三台那時候競爭性就很強，因為三台每個人都可以獨立作業，因為所有的程序，我都瞭解，我就不需要去問別人，我幹嘛把獨家去問別人（受訪者 W6）。

以前的記者，他（會）覺得他自己問的很周延，別人問的絕對不會比我好，我才敢走（離開採訪場地）。現在不是阿，有些人還不敢問，甚至遇到外國人，還要推一個英文好的！我們以前不是，以前三台的時候，大家是搶著問耶！搶著用英文問耶！現在不是，你會發現一群人只有一個人問，問完（其他記者）還要問別人：「他剛講什麼？」（受訪者 W3）。

現今，新聞台增多，記者人數跟著增多，許多媒體擁有者爲了節省成本，以相當低廉的薪資雇用年輕記者，記者儼然成爲廉價勞工。除此之外，SNG的出現，強調立即、即時，然而在記者訓練不足又要求速度的情況下，更容易落入人云亦云的窘境，大多資訊來源都是透過同業互相告知，而非獨自挖掘。

真正一個好的記者，他會挖掘新聞，那要挖掘新聞，第一你要取得你採訪對象的信任，第二你可能還要有一點私交，需要累積人脈，但是現在電視台記者都太年輕了，你叫他去哪裡挖掘新聞，所以只好去問同業，這就是盲從阿，你就看阿，一條新聞十幾台都到，就知道爲什麼（受訪者 W9）。

記者很年輕，開發新聞能力有限，在加上他長官要他早上兩條、下午兩條，他去跟別人合作，不管這新聞有沒有價值，但他可以最快取得一條可以播出的新聞，一窩蜂是無可奈何，而且現在事業主也不願意花錢養資深記者，事業主選擇最廉價又有收視率的（素材），比如說林志玲，麥克風一伸出去就達成一條新聞，業績就達成了...記者現在起薪兩萬八，我們進台視起薪六萬，你能期待兩萬八的記者扣掉稅兩萬四帶什麼腦袋進來呢？他連三餐都餵不飽了，記者變成記者工，他跟一個 7-11 打工的有啥差別，你期待他能有什麼腦袋嗎（受訪者 M3）？

薪水低廉，加上過度競爭的媒體環境，稀釋收視率，記者的身價一落千丈，得不到掌聲，成了過街老鼠，也降低了他們監督政府、打擊犯罪，作爲無冕王的動機。成就感不在，那何必「錦衣夜行」（受訪者 W3），同業一起合作，達到一般水平，不要漏新聞，能領到微薄薪水就罷了。

我們以前成就動機非常高，以前在台視時有 13 個收視率，回到家時，大街小巷都在看我的新聞，我的新聞是有影響力，我今天罵說那個水溝很爛，跌死一個人，隔天交通部就打電話來說：「陳小姐你要怎樣」，我說你把路給我修好，不要有人跌死在那邊，那他說：「陳小姐我們已經修好了，可以幫我們做個報導嗎？」我成就感就來了，因為我做了一件善事，我的新聞有影響力，覺得工作很神聖。那現在的孩子你不能怪他一窩蜂、不努力，是整個新聞收視率被稀釋掉了，每一台都只有零點幾，當你稀釋掉之後，你的新聞到底有沒有人看啊，到底有沒有在乎你的新聞啊，沒有那個成就，就互相影響，不要漏就好了（受訪者 M3）。

處於媒體過度競爭的環境中，台灣媒體惡質的現況讓人害怕，而在記者內心，已漸漸尋找不到昔日的成就感、理直氣壯，記者應該扮演的第四權監督角色，已漸漸消失不見，大多數民眾對媒體沒有反應，甚至充滿敵意，認為新聞媒體是萬惡淵藪，而非協助社會進步、幫助社會成長的媒介。

第二節、常規層次

一、集體性的束縛與停滯

行文至此，都將「一窩蜂」視為「動態」，有蜂擁而上的意思；哪麼，若將「一窩蜂」視為「靜態」？例如，記者怕漏線，怕獨漏，一夥人窩在一起「蹲點守線」，不敢恣意離開採訪現場，就是一種靜態不動的一窩蜂現象。為何如此？是否有任何有形無形的規定制約了記者，使得他不敢擅自離去？或許可從「新聞常規」加以探討。

Shoemaker與Reese（1996: 85）將常規定義為「新聞媒體組織為完成任務，所發展出風險最小、最不會出差錯之可重複使用，成為慣例的工作程序」。從市場導向新聞學的角度來看，新聞被視為產品，生產材料來自外在消息來源的訊息素材，為了使產品可以符合大眾需求，必須製作一套管理程序，媒體機構才能將大量且即時的新聞產品如期轉送給社會大眾，新聞常規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（Mcmanus, 1994）。新聞常規的好處在於使個人與組織間可以相互校準，幫助新進工作者在陌生混亂的環境中找到秩序（張文強，2005）。

一般在探討常規對新聞專業的影響，多半聚焦於組織對個人進行社會化的單向過程，個人透過預期（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）、遭遇（Encounter）、改變（Metamorphosis）三階段後（徐嘉瑜，2005），便接受常規，意味著社會化的完成。不過張文強（2005）研究發現，常規形成是透過個人帶著主觀經驗的猜測，與組織相互校準後，帶來有秩序、有組織調性的節奏。

人們似乎都需要秩序來處理每日工作，常規的形成可以幫助個人找到節奏、帶來秩序感，但卻也會造成「過度維護既有社會秩序」。Tuchman（1978）提出「新聞網」（newnet）的概念，因為網有洞，常規意理是捕大魚，側重合法或大人物的採訪，導致增強合法機構人士的權威，忽略了弱勢族群的聲音。次者，新聞媒體發展出科層組織，嚴密控管產品品質以符合組織要求，「使記者成為了『訓練有素的無能』（trained incapacity），眼光支離破碎，無法綜觀全局」（李金銓，1981: 57），「現在記者不認真，所以大家互相問，每次只能問到一點點，這邊一點點，那邊一點點，好，整合起來就是一大篇（受訪者C8）」。最後，常規強調「公正客觀」，但事實上，客觀平衡報導，僅是新聞工作的犬儒主義式的策略性儀式，用來保護記者與組織免於受傷害。

經由反覆進行例行工作，形成無須多加思考即能直覺以對的行事常規，然而常規雖能夠協助人們掌控事物，卻也在無形之中，產生一種受制約卻不自覺的「規訓權力」（Foucault, 1977 / 劉北成、楊遠嬰譯，1992）。Foucault指出，規訓是一種支配人體活動的微權力，控制力量是柔順的，當權力透過規訓力量而展現，往往受控者不會察覺，就像「常規」讓人對日常瑣碎習以為常。著名的圓形監獄理論，指監獄塔上不時變化方向的瞭望燈，燈光照射之處，可使塔上看守者清楚看見每個囚犯的行動，是一種有形的監控；然而，囚犯卻無法看見隱身背後的看守者，因此，即使燈光尚未照射到囚犯，囚犯心中也會有一盞燈，自我監視，不敢逾矩，形成所謂「無形的規訓權力」（紀慧君，2002）。

因此新聞組織內部在管理記者上，毋須動用規章典範，資深記者自然會身體力行，而新進記者會藉由模仿、校准後，內生「規訓權力」，規訓於組織。例如，主管會藉由監看友台新聞，確認自家記者是否漏線；雖然記者無法看到隱身於電視機後的主管，不過一盞無形的燈，仍然制約了在採訪現場的記者，使他們一窩蜂的守在現場、停滯不前，深怕消息來源突然出現漏了畫面，深怕別台記者在自己離開後，拍攝到重要畫面。

大家還在等新聞，或者是沒有人撤，就沒有台敢撤，你會覺得有壓力啊，為什麼他們不走，為什麼，那就先不要走，最好也要等到確定安全，或者是新聞（完整新聞帶）出來了（受訪者 C7）。

常規造成停滯與自我束縛，使得記者只願遵守不斷重複的規範，帶來的是組織 / 個人僵化，使其停滯在結構化、安全感（張文強，2005），與自我框架之中。結構化引導行動者的生活脈絡（Giddens, 1984），使複雜多變的環境，可以在結構化的引導下，理出脈絡；然而重複使用經驗法則，卻使得個人受常規再結構化，穩固準則，進而不願改變或忘記改變的可能，帶來組織僵化，使其缺乏創意、與挑戰，就算想要施展創意也只能界定為「更有效率地遵循一致性」（Merrill, 1996 / 周金福，2003）。

再者，平淡的常規節奏，帶給記者的是安全感，他們習於新聞機構安排好的安逸生活，不想破壞既有的節奏。例如記者會依循以往的思維，依賴特定的消息來源尋找線索，因為這種方式很「安全」也很「迅速」，不用花時間精力去開發新來源，而負擔可能出錯的風險（Tanner, 2004）。

最後常規限制記者在新聞採訪寫作上的創造力，「協助人們簡化世界，建立並組織真實之內在模式」（臧國仁，1999: 136）。換句話說，常規的好處包括了記者如何觀察、如何看待其他記者、以及如何瞭解上司想法，「我覺得這只是一個工作，長官要求什麼就做什麼，你要什麼我就給你什麼（受訪者 W1）。」但水能載舟、亦能覆舟，如此一來，有可能侷限自身潛力的開發，把自己的「創造力」、「個人獨特性」侷限在「一致性」中，甚至造成重大新聞判斷錯誤；嚮往

標準化與一致性的生活方式，已經內化至記者心中（張文強，2005）。

總結以上，個人被組織常規機械化，使其順服於集體節奏，體現在三層次：

（一）組織層次

記者在校准過程也同步將自己規訓化，清楚自我定位與角色，順從於組織上司規定，「我們是人家的棋子，要擺在哪裡，就是在哪裡（受訪者W1）。」，「現在長官都相信別人家記者，人家播的、人家登的，長官就覺得很重要（受訪者W3）」，因此，所有記者選擇、採訪新聞變得類似，以集體化，取代差異化。

（二）產業層次

指在採訪現場，與同業間的互動關係；在安全第一的狀況下，為免除「獨漏」的可能性，因此選擇集體行動來自保，也就是一窩蜂的同進同出，處理相同新聞、找相同消息來源，若判斷錯誤也是一家錯、家家錯，Shoemaker（1991）發現新聞工作者在面臨相同常規限制時，的確擁有類似世界觀，如所謂的「一窩蜂式新聞學（pack journalism）」就是體現了此種集體觀。

錯誤的訊息就錯誤的引用，跟報也要有跟報的技巧，因為報紙上寫的東西，大家都會覺得正確性比較高，其實不一定，其實正確性也是蠻低的，大家都在說電視新聞亂報，報紙新聞錯誤的也是蠻多，所以記者看報找新聞，就常常錯誤的引用，像是 SARS 那一年，不是有一個南部的醫生，他本來染 SARS，後來一度病危，但中國時報頭版頭，就說他死了，然後各電視台早上都有讀報，就都報他死了，但根本沒死只是病危（受訪者 M1）。

（三）新聞專業論述層次

學校教育以制式的規則，取代了對實驗精神、自由與求知精神，技術取向的方式，導致記者尚未進入新聞場域時「個人性」就消失了，被教育成屈膝奉承與懦弱無能的傀儡記者（張文強，2005: 25）。

聽長官就對了，他們才是守門人，我們頂多是去外面拍新聞，有時候出去之前，上頭就已經下達命令 這條新聞該怎麼作，不管到哪一個電視台，長官都有決定新聞該不該播的權力，即使今天你覺得這條新聞很重要，但是他是老闆 他就有權決定，我們只是小員工，不會去在乎要不要播（受訪者 W2）。

二、「速度政權」的宰制

上述新聞常規適用於所有新聞業，若獨立探討電視新聞，為免不了需考慮「速度追求」，與「一窩蜂」的關連性。電視新聞最大特色就是「臨場感」與「即時

性」，從無線電視每天4節新聞報導，到有線電視24小時無時無刻的畫面呈現，在在藉由時間與速度，呈現電視的寫實性，SNG現場直播，為最佳呈現方式。當新聞訊息的處理，被壓縮為「秒」計算時，就不難瞭解為何記者一窩蜂競逐的亂象，會成了「常態」，因為那是最簡單，可以最快連線的方式，例如第三章的新聞產製概況中，就發現記者在機場連線時，是如何妳一言我一語的取得最新進展，完成連線任務。

因為我時間不夠啦，我只能找別家（記者）有的經驗，我就直接去，因為問那個人一定問的到，就問他（受訪者），就不用花時間去周邊再去問，再去遍訪，因為我時間不夠，權宜之計（受訪者 C10）。

傳播方式的演進來自於傳輸速度的加快，從飛鴿傳書消弭空間間隔，到工業革命時，無線電纜傳輸訊號消弭了時間間隔，直到現今透過衛星訊號，藉由光之傳輸，速度不再著重空間、時間消弭，因為已經做到接近「臨時差」、「即時」的傳輸。也就是說，科技的進步，不僅抹平了地理空間的差異，更藉由電視的顯像，超越時間與空間的差異，達到「此時此刻」的目標；然而「競速學」的追求，卻也成為主導電視新聞內容的專制政權（Virilio & Kitler, 2001），Gasset就抨擊電視新聞，再現社會的方式，為「將現在壓縮為瞬間，再將瞬間壓縮為感官刺激」（轉引自Merrill, 1996 / 周金福，2003: 45）。

我覺得現在記者只要能把新聞帶回來讓我不會斷訊，有訊號就好了，很難要求，因為他每天都很忙，他可能十點就要去連線，11點就要趕回來做一條帶子給我，他不要出錯就好，你要知道新聞台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24小時都在 run，台灣的新聞台發展到不可思議的亂（受訪者 M3）。

電視媒介對於極速的追求，已經使得「速度」成為一種支配新聞場域的權力；Virilio（1995 / 楊凱麟譯，2001: 18）提出「速度政權」一詞，「速度政權」是「以速度所產生的暴力，作為權力的支配形式」，我們的社會從以前到現在，都是一種以速度政權為基礎的「競賽社會」。若運用在新聞產製，我們可以發現，在其支配下出現的產物包括了：1.先馳得點的追求；2.不問是非，只問是否能立即呈現的SNG現場報導；3.「速思家」的誕生。

首先，「先馳得點」的追求，來自於新聞為一高耗損的財貨，每則消息的價值以它的現實性作為衡量，新聞無法循環利用，而記者每天也只存活在當下，使新聞場域裡呈現一種持續的失憶狀態，並且養成了一種以「新鮮」與「過氣」的對立來評斷產品與生產者的傾向，也就是說，在此場域下，所有組織的競爭就會轉變為獲得最新（或獨家）的新聞，商業化越明顯的媒體，此現象就越強烈（Bourdieu, 1994 / 林志明譯，2002: 111-112）。Schudson（1986: 1）就認為，新聞行業的時間壓力，有大部分來自組織與新聞常規，觀眾其實並不關心，「即時性」的追求，成為一種「職業戀物癖」（fetishism of the present）。

「即時性」的追求，也成了媒介機構間集體且封閉的牽制力量，導致場域間一窩蜂的惡性競爭，淋漓盡致的發揮在2004年台灣總統大選，各家電視台的灌票操作；林照真（2004年10月）對各家電視台報導開票過程的監看分析就發現，灌票行徑是經過各家電視台，以電腦程式進行類比，並同時監看其他新聞頻道，以作為灌票增加之速度快慢的依據，此種灌票行徑，除了本身自我政治立場外，更是一種一窩蜂的集體行動，這隱含著時間節奏的概念，是一種「賽馬式」的輸贏新聞報導，建立對「結果」的預期（臧國仁，1999: 88）。

觀眾愛看啊沒辦法，我覺得現在有線台是綜藝新聞台，反正先壓寶，某家新聞的權威主播，就先把結論都打出來了，反正就「是」或「不是」嘛，比如說馬英九到底有沒有罪，有一台就先說獲判無罪，一直講無罪，到了最後關頭公布時，就馬上改馬英九被宣判有罪，前面就先猜了，那標題就先下（受訪者 M2）。

尤其是在重大新聞議題上，分秒必爭的操作手法，不僅是在數量上的領先，筆者參與觀察的有線新聞台C台，早在馬英九未起訴、外界傳的沸沸揚揚時，C台記者已經接獲主管指示，根據報紙、雜誌推測說法，先做好兩條完整新聞帶版本-起訴版、不起訴版。

第二，SNG在新聞製播上，有三項功能：一是播放時間的增加，二是即時傳輸-也就是現場連線報導，意指新聞製播可以無視於時空限制（張燦元，2000）。衛星電視台時常利用SNG填充新聞時段的空檔，媒體主管每天思考的不是新聞線索，而是什麼新聞事件可以做現場連線，有時電視新聞轉播將近40、50分鐘，現場記者早已詞窮，卻仍舊必須說個不停，造成新聞畫面貧乏化，這就是受制於新聞台整體播報的時間流程，以及組織間因競爭相互揣測的心態，而造成的盲目情境（唐士哲，2005: 85）。

你一個記者在車禍現場問問題，那個環境之下像是中天那記者問許瑋倫家屬，¹⁶ 我相信她沒有惡意，她只是希望這個家長講一點話而已，沒想到會引起這麼大風波，大家都罵她白癡；記者問受訪者有什麼感覺，大家只是希望他們講一點話，問的不得體，被 SNG 出來當然就很慘了（受訪者 M3）。

他們（有線新聞台）並不需要品質，求快就好了，我只要最快把這東西給你，有時候他（受訪者）講一些粗話，SNG 裡面發生了一些觀眾不宜的東西就播了啊，根本沒有辦法篩選，那他（有線新聞台）反正時段多，只要快，回來之後他們長官就會告訴你，等一下 1600（下午 4 點新聞）我就要播，你趕快去做帶子，我們（無線新聞台）就是 7 點播，記者還有時間做新聞，那他們時間掐的比較短，就談不上什麼品質（受訪者 M2）。

¹⁶ 中天記者樂秀貞在 SNG 連線報導時，詢問許瑋倫父親：「許瑋倫車禍，你現在的心情怎樣呢？會不會擔心許瑋倫回不來了？」，此句話，遭到線上網友強烈抨擊。

當然，還有組織直接將「即時新聞」與「留住觀眾視覺」（收視率）直接連結。在美國第二頻道擔任新聞主管的Andrew Finlayson 就曾表示，觀眾用遙控器進行「投票」，而通常會選擇停留的頻道，通常都是正在進行現場報導的頻道，因此他認為只要電視台保持連線狀態，就能建立電視台的聲譽（McManus, 2001: 3）。

新聞台為什麼有這樣的壓力，因為每一節的製作人他都有他那節新聞的收視壓力，當然主要的收視在 1200、1800、1900（中午十二點、晚間六點、七點黃金時段），可是我今天如果是 1600 這則製作人，我當然希望我的新聞不要一直重播前面的，我當然希望我的新聞有一些最新消息，因為根據收視率調查，觀眾在打開 1600 看新聞時，他會希望看到最新消息，於是他會希望記者不斷的發最新消息來，就是壓榨記者阿（受訪者 M3）。

這項新科技，持續使記者面對時間壓力，為了使新聞是在真實的狀態下（in real time）被呈現，各個記者都成了「速思想家」（fast-thinking），意指想的比影子還快的思想家，必須緊迫的思考與反應，但人在急迫時，是不能思考的，為何記者能在短時間內決定新聞重點為何？採訪對象為何呢？因為新聞內容，是記者「既定成見」的產物，他們放棄去瞭解當前的事件如何發生，動員預先製作好的解釋性計畫，尋求可參考的前例，處理「廣為接受的成見」，觀點是單一的、訊息是破碎的，新聞內容成了事先消化的「文化速食」（Champagne, 2005；Bourdieu, 1994 / 林志明譯，2002: 40-41），也就是為何各家新聞內容會日漸趨同。

這種「碼錶文化（stop-watch culture），成了新聞場域的生存價值，對速度的極致追求也造就了一窩蜂的產業心態，求快成了資訊篩選的原則，也主導了記者的新聞判準，久而久之，速度造就一個封閉的新聞內容產製系統，系統裡的記者看似獨立又相互默認、相互監控，最後在各行其是的「集體建構社會事實」（唐士哲，2005: 90）。從新聞常規出發，接下來應深入探討，還有什麼原因形塑封閉的新聞場域。

第三節、跨新聞組織層次

一、新聞系統的封閉性與引發激擾因子的趨力

不少研究指出，電視新聞組織，受到商業與政治力量拉扯，是一「他律性」很強的場域，所以媒體大喊「新聞自由」，希冀可以擺脫外界力量的束縛，如此呼聲，往往卻忽略了在運作上的新聞場域，其實是一個封閉性的系統，不斷自我生產元素，在新聞小宇宙中，自顧著玩著生存遊戲；換言之，新聞媒體在取材上並非在事情發生後才進行採訪，而是先驗性的、既定形勢的，與系統中的成員相互撞擊後，「自我再製」不斷更新的實在（新聞內容）（顧忠華，2006），這就

是Luhmann（2000 / 胡育祥、陳逸淳譯，2006）以系統概念所言，媒介新聞取材上，系統運作的封閉性（operational closure）。

依照Luhmann（2000 / 胡育祥、陳逸淳譯，2006: 42，52）的說法，新聞媒介的封閉性，使媒體將本身系統從環境中獨立出來；而當一個系統運作呈現封閉時，訊息處理的封閉性也會發生，當然這並不意味著，系統處於自由飄盪，與外界無任何因果連結的狀態中，而是新聞系統本身在行動時，不僅根據「自我指涉」（self reference），也藉助「異己指涉」（other reference）辨別訊息的價值。「異己指涉」可以被理解成新聞機構對於「外在環境發生什麼事」的掌握；「自我指涉」則是意味著機構在產製一則新聞並發送後，會對友台產生影響，達到某種功效的界定，包括機構間對於事件價值的相互猜疑，例如監看他台、瞭解同一事件發生時，對方會從何觀點切入，派出多少人力到達現場採訪，誰能最快獲得新畫面傳回公司等判斷，也就是說，「新聞是做給同業看的」，有相互較勁的意味，為的是降低經營的不確定性。

就是會看看其他台跟我們處理的方式有沒有什麼不同，或是說角度有啥不同，因為現在新聞同質性還頗高，就只能看處理的角度跟手法（受訪者M2）。

李林容與陳翔（2002年5月）研究中國大陸報業趨同現象，發現是因為保守主義在作祟，而保守主義的特質就在於封閉性與排他性。封閉性代表著故步自封，不願創新，排他性則意味著對競爭者的恐懼，因此大陸報業走向一種單向、模式化的內循環狀態，而這樣的狀態是相當穩固的，也就是說，如果新進者想要進入這個市場，必須在格局既定的競爭前提下，才能被趨同化的市場給接受。

封閉性所帶來的競爭，在於「訊息」與「非訊息」的差別，而非「真」或「不真」之區分（Luhmann, 2000 / 胡育祥、陳逸淳譯，2006: 87），即非真實的消息，不會被排除在新聞選取上，只要它是立即又新鮮的素材，那怕只是一句話、一個畫面，就會被系統納入。這可以用來解釋為何採訪現場的記者群，一個風吹草動，拿起麥克風不問黑白是非與真假就衝向前去；SNG立即連線，新聞記者不知所云，甚連電視螢幕跑馬燈的資訊都時常出錯。但「不真並沒有當作反省值來用」（Luhmann, 2000 / 胡育祥、陳逸淳譯，2006: 86），只為能夠取得「新訊息」，若再加入「自我指涉」與「異己指涉」這組參照符號來看，不僅要取得新訊息（當然，因為場域封閉性的關係，所以大範圍的取材內容是趨向雷同），更要在所提供的內容與形式上，有小部分的區分，例如多了一個別家媒體沒有的畫面而成為「獨家」，像是TVBS記者，在飛機上拍攝到王又曾夫婦被遣返美國的畫面，對於新聞同業而言，這就是好新聞。

另外，新聞系統，雖是一封閉的自我生產系統，不過藉由「自我指涉」與「異己指涉」相互激盪下，媒介所建構的現實，成了一種持續不斷的傳播行動而驅使

的一連串「激擾」，使得大眾媒體不會拋棄社會、離開社會。

Luhmann (2000 / 胡育祥、陳逸淳譯, 2006: 40-41) 以愛滋病的新聞為例。愛滋病的話題，並非新聞媒介的產物，大眾媒介只是吸收了這個議題，並且利用既定的報導方式，再度談論它。也就是說，媒介的產物是在「早就已知」與「對進一步訊息的需求」為前提下，造成系統內外的相互激擾。換言之，愛滋病話題現已不會著重在病情介紹，治療方式等瑣碎事物，而是在於是否有進一步的愛滋病訊息出現，可以關注與報導，即為藉由新瓶裝舊酒的方式，在既知的話題上。添加驚奇，以確保媒介的傳播行動可以延續。

當然，媒介企圖引發「激擾」的特性，最終仍歸因於「自我指涉」，意即，系統內各媒介的經濟條件、競合關係，以及記者揭露某件訊息時，所引發的騷動，比新聞內容本身的價值還要重要。此一概念，等同於媒體間議題建構與流通時，所產生的「共鳴效果」(consonance effect) 與「溢散效果」(spill-over effect)，Noelle-Neumann與Mathes (1987) 在研究西德媒介體系時，發現大部分的記者有相互參考報導內容的狀況，而媒介當中也有所謂的「意見領袖媒介」

(opinion-leading media) 與追隨者，稱之「另類媒介」(alternative media)，當一則「意見領袖媒介」報導重大事件時，其他電子、媒體也會一路追蹤，形成一股連鎖反應(翁秀琪，1992)。

像之前鐵路怪客大家一直跟著播，在於說我們都喜歡把一些東西做到吃到飽吃到你想吐，然後就結束這樣。(問：可是為什麼不是吃到剛剛好，讓顧客還會進來吃?)，因為我們找不到下一個議題作啊，如果那時候有下個議題，比如說胡瓜那時候不是大麻案嗎？然後大麻案炒一下，突然有人跳出來救了他，就是周政保，大家都開始轉到周政保，然後胡瓜的事情就嘎然而止，其實胡瓜那個案子那時候還沒到吐的程度，但有更新的話題吸引我們注意，我們就做了(受訪者 M1)。

從訪談中又再度證明，系統的「自我指涉」有著強大的牽引力量，那麼系統間成員是用何種方式互相牽制呢？可從「集體生產」談論。

二、禁錮效應中的集體生產

從系統觀點，發現新聞場域本質就是一個束縛很強的小宇宙，成員間如同星球受場域內其他星球的引力牽動，若再將「過度競爭」放入系統裡，束縛就會更大，產生的是更強大的封閉與意識禁錮效應，導致「獨佔產生一致，競爭也趨向同質」的情況，原因來自於系統內的產品，屬全體成員集體生產。

若結合「競爭」與「集體生產」兩元素，也就是試圖在場域內，藉由與他者(同業)互動，進一步超越他者，表現在新聞產製上，包括1.讀遍報紙(看遍友

台新聞)：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要知道自己要說什麼，先瞭解他人如何表現；而編輯們也會很緊張其他媒體、報紙有沒有報什麼 (Frank, 2003) 2.跟從：爲了製作晚間新聞，需看過早報與午間報導。「公司裡的一排電視是給長官看的，長官看那一台有新聞，我們沒有，就派我們去 (受訪者W3)」3.談論他台新聞取向：編輯會議上的大部分時間，都在討論爲何「漏新聞」？如此作法，是爲了謀求不同，但花了大半力氣，卻也只是製造出「些微差異」，除非一次監看多台電視或報紙，否則一般閱聽眾根本感受不出差異性，但是卻會表現在收視率上。

(問：有去評估這樣競逐之後的收視率真的會比較高嗎?) 問到重點了，好像也不一定耶，可以明確的就是說，當大家都一起播的時候，就分不出什麼差異了，可是當你不播的時候，就會有一點差異，我很少看到很少有新聞台敢去挑戰說我就是不要 (受訪者 M1)。

從上述發現兩個關鍵，首先是新聞媒體喪失主體性，一味從眾，其二是，更導致了隱而不顯的「新聞檢查效應」，深植在所有記者身上 (Bourdieu, 1994 / 林志明譯, 2002: 30-35)，當然另有「生存心態」造就一窩蜂現象，參見第五章討論。新聞檢查效應，前小節有稍微提及，體現在記者「怕漏新聞」這件事，主管也可藉此監督記者。

長官在冷氣房裡面，就是看看報、監看別台，所謂辦公室的長官，不一定每條新聞都要，如果他今天播十條新聞，有5條不應該漏，他就會盯他的記者，那記者說，沒關係啊，我今天漏，我給你個更好的獨家，OK，我可以接受，如果你今天一整天都在混，你跟我講沒新聞，我卻在別家看到你線上的新聞，那你就完蛋了，我看別台是在監督我的記者在幹嘛 (受訪者 M3)。

不過，Bourdieu (1994 / 林志明譯, 2002) 是從競爭著手，忽略掉了「合作」與「集體生產」兩元素也會產生新聞同質的現象，最爲明顯的例子出現在「地方新聞」，由於人力編制的不足，且離台北總部甚遠，久而久之，地方媒體記者組成聯盟制度，除了一同跑新聞外，更形成同業間「互相代班」的情況 (賴富山, 2002)，由每天的輪值記者拍攝畫面提供各家媒體使用，所以地方新聞總給予人「轉來轉去都一樣」的現象 (江聰明, 2002年11月5日)。「地方記者尤其不可能跑獨家，一家烤肉萬家香，你敢跑獨家，明天休假時，你就給我試看看 (Q：那在台北?) 比較少，但你不可能成爲你同業中的公敵，你不太可能去得罪你所有的同業，頂多你分兩掛，你屬於其中一掛，要是我今天漏了，你拷 (新聞帶) 給我 (受訪者M3)」記者們相互合作的方式，除了應付人力編制的不足，更需預防「漏新聞」的可能性，藉由合作機制，與同業「調片」，應付媒體管理者 (黃義書, 2000年5月)。

相互依存啊，你不可能一個人打遍天下，你沒有多少時間，真的啦，像D君還不算是很認真的，但是她可以很厲害，不漏新聞，有些人是那種死振

作，做到時間過了，還是一樣拼不過人家啊，就是花自己的時間花了很多心血，來這邊抄庭表，那你問 *D 君* 怎麼會知道的，就問同業啊（受訪者 C12）。

記者們平常在採訪現場相互溝通，久而久之，協商出一個可被共同接受的「組織觀點」，稱「集體同意」，此互動行為，隨即逐步形成內部抽象思考系統，形塑出共同世界觀，不過卻也限制了記者們對「社會事件的主觀解釋與思考結構」（臧國仁，1999），造成一致性。

通稿就是像這種大家都知道的東西，這種沒什麼好去瞞人家的，大家會打電話合作，當然偶爾有，某一個報紙的新聞，我們可以發展出一則獨家有沒有，那個當然是例外啦，那如果在沒有的情況下，一般見報的東西很難在有什麼獨家啦，那我們就一起做省點事啦！像我本身是跑北市的，那我對北縣不太熟，他們的幫忙我就會省很多事（受訪者 C10）。

當然，也有一種模式是結合「競爭性共生」（competitive symbiosis）與「集體生產」兩元素，所謂「共生」是指兩種不同個體發展出互相有利的關係，整句話來看，顯示兩者間既合作又競爭，是一種「互利互賴」（mutual dependencies）的競合關係，此一論點原先用在記者與消息來源，初期交換協助完成共同目標時，均力圖握有互動合作的主控權：「雙方交換利益的同時，各自會嘗試保護自身的資源，並且會用最輕鬆的方式掠取對方資源。若過份依賴另一方，代表軟弱，亦受對方利用（Wolfsfeld, 1991: 551）。在同業間，也有競爭性共生的狀態存在。

問題是你要去打人家（獨家），你還要打的有技巧，讓對方覺得不會很痛，可以說是長官交代的或是怎樣的關係，讓自己有台階下，不要去得罪太深，因為有些人選擇說，死讀書，他不會去觀察，有些攝影比較有 sense，會去觀察周遭，又要不動聲色，你要去觀察你周遭的環境，動作又不能做太大...（受訪者 C10）。

競爭又合作吧，我也許跟你合作六天，第七天我可能就消失去做一則獨家，在中天、三立都有要求記者一個禮拜交一則獨家出來，所以平常就輕鬆一點，我跟你合作就好了，你有我也有，但是其他時間我就經營我的獨家，不可能要求你每一天都跟別人競爭，你沒有那麼多新聞線索（受訪者 M3）。

記者競合關係，雖顯而易見，但仍屬台面下的不成文規定。不過在日本新聞界，卻有台面上由政府組成的集團-稱之記者俱樂部。它是一個日本獨特的新聞發行機構，至今已有100多年歷史，由日本新聞協會加盟社的報導機關派遣特定記者，組成名為社交，實為採訪的俱樂部，設立在各大公共機構內的記者室，室內配有電話、辦公桌、椅子等寫稿、發稿所必需的設備，供各報社的記者自由使用（靖鳴，2006年3月）。

在台灣，則有媒體組織老闆主動結盟，如1999年由TVBS董事長邱復生發起，

組成「衛星電視新聞發展聯誼會」，達成初步協定，若遇到重大災難事件，各新聞台不再一湧而上，改由值月台負責採訪事宜，提供同業使用，避免記者為了搶新聞而阻礙救災事宜（尙孝芬，1999年10月12日）。當然，聯誼會的功能也會用在抵抗「消息來源」的操弄，如柯賜海與董念台事件（江聰明，2002年7月12日）。

17

以前電視台記者都可以到樓上大法官辦公室拍，那時候記者都在法院跑來跑去衝撞，亂衝衝過頭，拍打架啊，很沒有規矩，那陣子每次連線，柯賜海就在後面拿牌子有沒有，記者常常會跟他槓起來，後來有一天，突然司法院下了一道行政命令，所有記者不能到法院裡面，都被趕到法院外面。

當天我就召開司法聯誼會記者會議，把在電視台、報社跑2.30年司法線的記者找來，還有通知法官，隔天早上八點，所有記者會在司法院門口排一排，要法官們給一個說法。

那時候主任就來關切，說不要這樣難看啊，我就說你行政命令已經下了，事先沒有跟我們溝通，我們行之有年這麼多年都是這樣跑新聞，你今天有個柯賜海就下這樣的命令，你要搞清楚，今天是因為柯賜海在這邊打架，記者才衝進去採訪，打架又不是記者造成的，現場有這麼多法警，你法警沒有好好管，讓這件事情發生，你都沒有錯嗎？你把責任推託在記者身上。

隔天早上我就叫所有記者，在法院前面站成一排，所有電視台報紙記者全部到齊，報紙新聞也刊了這則新聞，後來當天下午他就找我們記者協調好，在法庭設一個區給記者拍，願意接受採訪的就停下來，不願意的就走進去，而不是把記者全部擋在門外啊（受訪者W6）。

看似美好的記者聯誼會，卻是導致新聞日趨同質性的罪魁禍首，根據1993年日本新聞協會研究所，對新聞記者所做過的調查，對於「關於記者俱樂部的負面作用」的子選項中，認為「容易造成報導雷同」占73.7%，「訊息容易被操作」占64.9%；「降低了記者的能力」占46.5%，「不能獨立自主採訪」占37.9%，「對於非在籍記者來說具有封閉性」占51.1%，從調查中發現，連記者本身都承認，記者俱樂部的存在造就了「照本宣科式的新聞報導」，因為在記者室內，每天都會有記者會的資料供應，情報來源全然依據封閉的政經官僚系統，長期下來，養成大部分記者直接抄襲的惰性（張放，1999）。

記者俱樂部所帶來的負面影響，正巧與「一窩蜂式新聞學」(pack journalism)相呼應，Frank（2003）指出，記者俱樂部成員視本身為遭馴服的牧群（a docile herd），牧群們被馴化為視「獨家新聞為敵人」，也就是說，若俱樂部的其中一

¹⁷ 由於各台播出柯賜海、董念台法院前打架事件，遭新聞局罰鍰，因此各新聞台達成共識，不再隨之起舞，播出爭議新聞（江聰明，2002年7月12日）。

位記者握有消息，那麼必須分享給其他成員，除非脫離這個環境，因這裡具有強烈的封閉性與排他性，雖有特例，但相當少數。

我們以前有個彰化記者，他是從來不跟同業聯繫的，所以就八家打他一家啊，那狀況甚至糟到其他同業在採訪時，會把他麥克風打掉，但他還是可以做很多獨家，讓他們氣的要死，就是要有這樣的本事啊，這樣的記者不是沒有還是有，但是這少數啦，通常你不會整天跟人家對槓嘛！這樣你的日子也很難過嘛！（受訪者 M2）

據上述，俱樂部的封閉性，造成同業間一致趨向尋找相同新聞線索；另一方面，也隱含著記者一致趨向於單一消息來源的可能性，¹⁸ 或可用「異己指涉」稱之。從「媒體外層次」出發，接著下來，就要來探討「他律性」與「市場導向」如何牽引著電視新聞產製過程。

第四節、媒體外層次

Bourdieu用場域的概念，來解釋記者如何受外界力量的束縛，他說，每個領域在「他律」（heteronomous）與「自主」（autonomous）兩軸間搖擺，而新聞場域本來就是一個自主性極少的溝通工具，受到其他場域一系列的束縛，束縛來自於記者與社會的關係，若當此場域越來越市場導向，也就會受到經濟場域猛烈、無情的力量拉扯，「他律性」隨之增加，直到最後演變成荒謬的競爭關係，不過Bourdieu說，資深記者有可能改變自身在場域的定位，基礎就在於他們的經驗與文化（Rodney & Erik, 2005）。

老三台時代，只有文功會一隻黑手會伸進來干預，商業化後，每個老闆都是黑手，有上萬隻黑手伸進來干預，而且官商勾結；現在有線電視開放後，電視台從賣方變買方，為了廣告營收，也不敢得罪一些大企業老闆，企業一年有 20 億的廣告預算雜下來，一台分個兩億好了 也是很大的數目，所以大家都不敢報（受訪者 W9）。

上述所言的「他律性」是指「市場經濟力量導向」的層面，除此之外，「他律性」還包括了提供記者每日報導素材的「消息來源」，而消息來源是如何驅動記者，使大家一窩蜂隨之起舞？

以前叫他（消息來源）過來就過來，他們想上電視阿，現在操作手法不一樣了，現在他們（消息來源）玩陰的，好比我故意把消息放給一台阿，大家都沒有，大家就會開始找他了阿（受訪者 W3）。

¹⁸ 記者俱樂部，提供了記者與官方機構沾黏在一起的活動空間。

Gans將兩者關係形容為「舞會中的男男女女」，意指兩者間都想帶領另一方起舞，不過通常消息來源會稍佔上風；Weaver與Wilhoit則以類情人關係形容兩者「你如果搔了我的背，我也會幫你抓抓癢」；Wolfsfeld則稱兩者為「酒肉朋友（fair- weather friends）」（轉引自臧國仁，1999: 333）

當然，兩者間的關係不只是一種型態，Gieber與Johnson（1961）藉著彼此利益與價值觀重疊的程度區分為「對立關係」（完全不重疊）、「合作關係」（部分重疊）與「同化關係」（完全重疊）三種互動模式。喻靖媛（1994）依照雙方關係特性，區分為「對立關係」、「共生關係」、「同化關係」與「表現接觸關係」；O’Hefferman（1994: 223）則提出「共同進化（co-evolution）」的概念，意指兩方相互緊密依賴，彼此影響對方的進化方向與速度，然而兩者並非「合體」，而是形成一種「十分分離，但又相互侵略的生態系統」。臧國仁（1999）在歸納後，發現上述關係，是有時間性的，隨著時間的延伸，兩者會由疏至親，逐步晉級至同化關係。據此，我們發現路線記者到最後，對於消息來源的「認同程度」甚至高於報社高階主管、同事，在心理上產生了極高的「內團體感」（喻靖媛、臧國仁，1995）

隨著個人「交際鍊」的擴展，讓記者累積足夠的採訪人脈，形成難以轉移的資源；決策者若要操作新聞，就必須仰賴記者的資源，因此讓記者個人找到可以牽制組織權力的力量，爭取個人存活空間（吳佩玲，2005），也就是說，記者因為消息來源的關係建立後，對組織內擁有了相對的自主權，但，卻有可能淪落為受消息來源操控的對象。

Hall等人（1978）所發表的《監控危機》，特別警告新聞內容有「第一定義者」與「第二定義者」，前者就是消息來源，常常是社會中的宰制團體，包括政府單位的發言人或公關人員，擁有強大的意識型態力量，對事件有強大的解釋力，常引導第二定義者（記者），報導的觀點，消息來源操控媒體的方式明暗皆有，步驟包括提供硬體素材、配合發稿時間、私下透露，因此到最後，影響了記者在主要訊息中的選擇，使得各家媒體報導趨同。

郭台銘那個（事件）壹周刊專訪的那個人，我們找了好幾天，去他家守了，都知道他住哪裡，但有些當事人可能也會選擇媒體啊，那是沒有辦法的事，不是說我不努力，我每天都很努力去那邊，經過各種手段，可是我接近不到你，可是你當事人卻選擇壹周刊，我又有什麼辦法，那壹周刊就播出來了啊（受訪者 M2）。

前章所提的記者俱樂部，大部分資源就是來自於政府單位，首先是對資訊取得通路的掌握權，在美國「記者室」就是關鍵，Rodney與Erik（2005）發現，記者們被鎖在白宮提供的小房間裡，在與線上同業朝夕相處、互相影響下，久而久之甚至把它當作一個小家庭，消息來源就可以藉此操作他們，例如記者只能在這

小房間裡用電話與白宮聯絡，若記者拒絕記者室的安排，將會發現無法取得任何線索。再者，政府官員會事先獲知記者與攝影到達的行程表、發稿時間，來安排記者會，這就是「官僚組織的親密性原則」(bureaucratic affinity)(林照真，2006)。最後消息來源會將記者分類，友善組將可以得到最多的獨家消息，如此設計方便控制「聽話」的記者，也變相懲罰了「不聽話」的記者(姜敬寬，1997)。

久而久之，記者們遭「馴化」，開始與消息來源享有共同價值觀，逐漸無法洞悉任何社會衝突；在日常採訪中，也只期待完成例行性工作，無法深入剖析爭議性事件，尤其路線記者也已經相當習慣被「餵食」新聞，久而久之就失去追逐獨家的能力(林照真，2006)。不過，也有論者指出，跑獨家、揭發重大醜聞而聲名大噪，或是最受尊崇的記者，往往是奴性最重，越是被權勢馴服豢養，「因為他們必須向權勢效力，才能獲得『最佳』新聞來源與通路」(Lee & Solomon, 1990 / 楊月蓀譯，1995: 28)。

馴化的結果，就導致採訪作業的路線走向建制化與常態化，記者傾向聚集在一起，在同一事件、同一路線，一起等待消息來源的餵養，隨立委爆料起舞(參見鍾書呈，2006年7月)，改變了記者的獨立角色，使記者發產出一種「集體意識」，反而使得新聞場域走向「倒退新聞學」(林照真，2006)或「爆料新聞學」(彭敏，2006年7月)。

第五節、社會文化層次

「意識型態」，指社會體系、價值與信念所反映的世界觀，是一種整個社會多數共享的價值體系。而新聞內容的表現，就是在反映一個社會結構的文化與意識，所以記者在守門的過程中，也反映了該社會的文化價值觀(林東泰，2002)。「意識型態」除了會影響新聞「報導」的偏向，也形塑了記者「採訪」的方式。到底是怎樣意識，形塑了社會價值觀，進而造成記者一窩蜂的從眾採訪方式，可從中國人的社會發展心理學談論。

何友輝等人(1991)從集體取向、社會取向與關係取向中，歸納了五點中國人的心理狀態。一、集體利益為重；二、重人情；三、高度他導性；四、和睦為先；五、從眾。

中國人的理想思慮原則以整體社會為出發點，是「親社會」、集體取向論的，以群體利益作為社會行動的最高指導原則，為滿足群體要求，甚至可以犧牲個人利益，奠基在「互助」、「互報」上，也因此個人是被整個社會的責任義務所聯繫，有著強烈的「從眾壓力」；不像是西方以「自主」為導向，排斥社會加諸個人的束縛，以個人自由為最高原則(何友輝、陳淑娟、趙志裕，1991: 54)。或許記者一窩蜂式的採訪，正是屈服在以整體路線記者們的利益為最高原則，也就是說，不能自行跑獨家，否則就有被「獨漏」的危險，就算要跑獨家，也要小心

翼翼。

其實這種東西你今天得罪人家，是現世報，公司收視是公司收視，那你幹嘛去豎立敵人，真的很難啦，你又要做給長官看，做出你又有獨家，又要不得罪人家（受訪者 C12）。

跟人家（同業）講（線索），是為了生存，同業以後也會跟你講，關係都打好，這行作事情不是很重要，但是做人很重要（受訪者 C14）。

再者，「重人情」源起於「受人點滴，當湧泉以報」的傳統規範，在人與人的互動中，有著複雜的虧欠與義務系統，「人情債」這詞兒，就可充分表現。將這關係放在記者與消息來源身上，可以發現記者會使用「放長線釣大魚」的方式，經營兩者關係，慢慢釋出資源、靜靜等待對方回報更多內幕消息；此外，同業間的「拷貝帶子」現象，也是一例：「今天漏了這個畫面，借你拷貝，哪一天，我也會得到你的回報」，有著所謂的禮尚往來。當然拷貝帶子有個不成文的規定，是場域間的生存心態，也是象徵暴力（詳見第五章討論）：1. 如果是獨家（單 mic 訪問消息來源）不拷貝，若是有兩台以上有這則畫面，就可以拷貝。2. 自家長官以前是他台長官，就會通融記者拷貝給他台。3. 記者跳槽率很高，會因往日同事情宜，而給拷貝。



圖 4-1：拷帶畫面

資料來源：本研究拍攝

就是這條新聞我沒去，我判斷錯了，但我覺得我想要，我就會去拷帶，拷帶的原則是這條新聞不是你的獨家，你獨家你也不會拷給我阿，這條新聞是大家都去了阿，你拷給我就是給我人情，下次搞不好你來拷我的阿，互惠合作，你幫我我幫你，因為我拷給你沒有損失，我不是獨家（受訪者 M3）。

你總有會漏的一天，你今天漏小的，你總有一天會漏大的，就死的很慘，一次就夠了，你懂嗎？所以跟同業的關係建立是要讓自己好做事，因為你這樣得罪人家又何必咧，你問人家，人家就不會跟你講，你這樣會好做事嗎（受訪者 C12）？

你開始跑的時候，因為你是菜鳥，你就會很勤快的打電話給每一個人，說誰誰誰你好，什麼哥什麼姐你好，我是 TVB 的誰誰誰，阿今天有什麼事，就是要報稿給各家的哥哥姊姊們。我之前很認真報稿給所有的前輩，我會提

前去公司把四大報看完，然後像我顧北縣我就會打所有警局電話去問，有沒有案子，然後他們（警察）會講，阿你就統籌跟大家講，那大家要不要去是他們最後會決定，你第二通在問他說：「阿那你們最後會去哪裡啊」，他就會告訴你，所以就要有一點回饋啦，你要讓她有動機打電話給你，他打給你一定是說：「快點啦，我遲到了，快告訴我今天北縣有什麼事」，阿你就是跟他報報報，就是你要廣結善緣（受訪者C6）。

「他導性」意指趨向受他人導引，包括讚許與指導，並以「避免他人非議」為基本訴求，因為中國人總是在乎是否被他人接納，獲得他人認同，也就是「面子」問題，當一個人覺得有面子會感到榮耀，若失了面子會覺得沮喪，因此「面子功夫」是中國人的生存心態，「作面子」意指，讓他人愉快榮耀，具體作法是：一、保護對方既有面子（如記者保護消息來源不曝光），二、讓對方遠離沒面子的機會（例如盡量讓消息來源的新聞上報）（王珍瑜，2006）。

「和睦的人際關係」為儒家的中心思想，和諧少爭是理想的社會秩序，但，若記者要扮演好「第四權」的監督角色，就容易時常得罪政府官員、公司大老闆，這也使得記者一窩蜂的報導商業大老闆的優良形象，直到企業內部問題已經大到不可彌補，影響眾生，一家「大膽」的媒體首先揭發，他家記者才敢跟進，但，這又不免是一窩蜂的集體行動。

像之前毒蠻牛事件有沒有，剛開始各家第一天都不敢打上「保力達B」的名稱，因為這廠商在各大媒體，都砸下不少廣告費，要是得罪了，是很可怕的！後來因為平面（媒體）都登出來，我們就跟進，大家都一起報，就比較不會怕。還有像之前Nike事件，平常跑體育的就不會去跑，而是由我們社會出頭，畢竟（跑體育的）不能斷了新聞來源嘛（受訪者W2）！

總結上述，集體主義、他導性與和諧的人際關係，使得中國人個體在群體取向下，不敢自表、傾向從眾，個人對文化規範唯命是從，依偎在群體底下，屈服於群體。

在瞭解一窩蜂現象源由後，接下來本文將援引Bourdieu的新聞場域理論與Giddens的行動結構論，提高層次，加以深化，瞭解記者在工作情境中的實際運作過程，以作為研究時，更為具體的參考指南。